

# 山东地区出土 东周青铜矛初步研究

□ 刘晓婧

从考古发现来看,山东地区已出土的东周青铜矛多达 90 余件,与戈、剑、镞等构成东周墓葬基本兵器组合,但目前相关专题研究并不多见。2001 年,王青先生在《海岱地区周代墓葬研究》<sup>[1]</sup>一书中,对周代青铜矛进行了型式划分,简要总结出三角形矛和柳叶形矛两种发展脉络。本文对该地区东周青铜矛的形制及文化属性进行了进一步分析,探讨其形制演变、文化背景,并初步判定出齐式矛的特点。

矛是一种刺杀兵器,矛头是其发挥杀伤功效的关键部位,形制差异也最为显著。因此,对青铜矛的形制研究应主要着眼于矛头。加之,山东地区出土的东周青铜矛少有铭文,因此根据矛叶、骹及整体形态差异,可对其型式划分如下:

A 型:阔叶矛。尖锋,侧刃圆弧,叶底圆收与骹连为一体,多为圆骹。出现于春秋早中期,延续至战国早期。

I 式:双刃。侧刃宽阔,叶中部最宽,锥状脊。叶部逐渐变窄,骹渐变短。包括春秋中期的临沂凤凰岭墓坑(编号)44-55<sup>[2]</sup>、滕州薛国故城 M1:35<sup>[3]</sup>、春秋晚期的临朐湾头河墓矛<sup>[4]</sup>、战国早期的莱芜戴鱼池墓矛<sup>[5]</sup>。标本 1,薛国故城 M1:35,刃锋利,柱状长骹末端有对称钉孔,通长 26.4 厘米(图一,1)。标本 2,莱芜戴鱼池墓矛,圆筒状骹,上有钉孔,通长 11.6 厘米(图一,2)。

II 式:三刃。战国早期的济南左家洼 M1<sup>[6]</sup>出土 2 件同形制,原报告误订为“镞”,弧刃前聚成峰,无脊,骹呈上窄下宽筒形,上有钉孔,通长 14.8 厘米(图一,3)。泗水尹家城水井遗址也出土过 1 件 J101:1<sup>[7]</sup>,实心三棱锥状脊,属于战国时期。

B 型:窄叶矛。侧刃较窄,叶缘弧度较小,叶底

部略宽于中部,圆骹口,骹长。流行时间与 A 型矛基本一致。

I 式:双刃。矛身扁菱形截面,圆筒状骹。脊两侧血槽逐渐变宽。包括春秋晚期的莒南大店 M1 矛<sup>[8]</sup>、战国早期的临淄淄河店 M2 矛<sup>[9]</sup>、期属不明的枣庄沙沟采集矛<sup>[10]</sup>。标本临淄淄河店 M2:G15,前锋锐厚,残长 12.4 厘米(图一,4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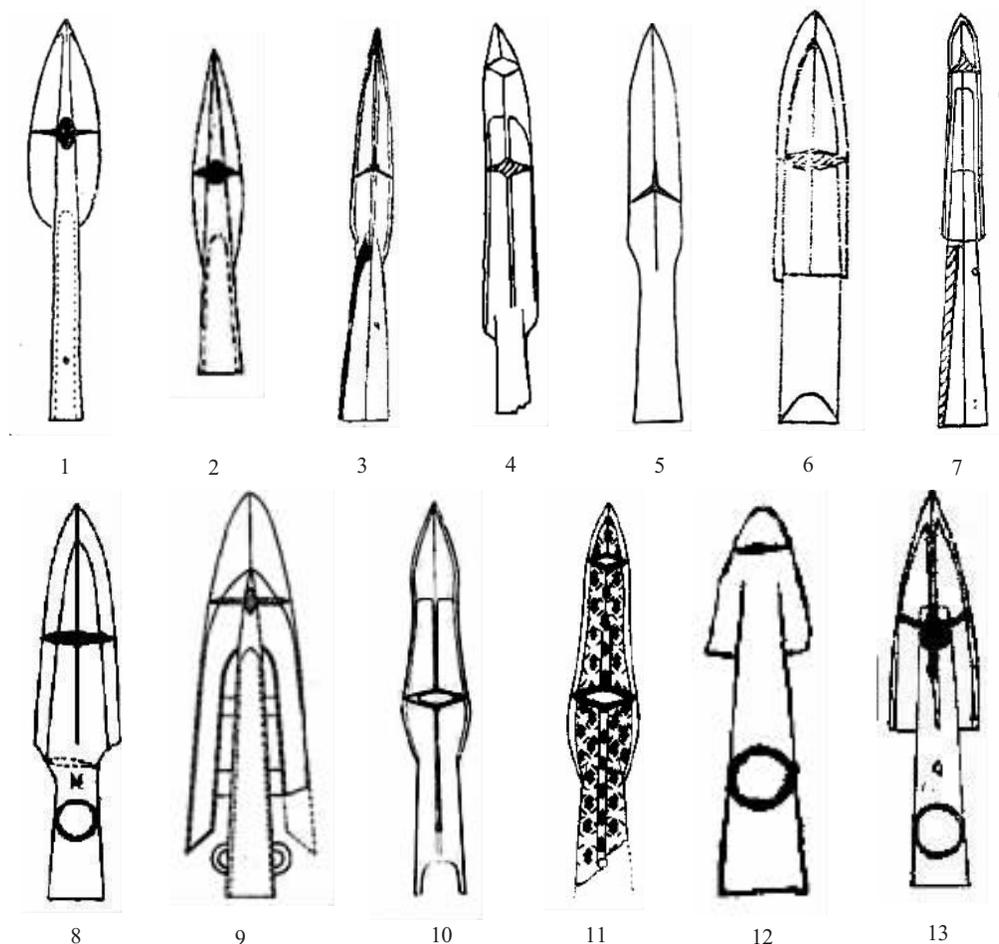
II 式:三刃。侧刃窄长,前聚成锋,长骹,无脊或三棱柱状脊。包括战国早期的烟台金沟寨 M12 矛<sup>[11]</sup>、淄川北沈马 M2 矛<sup>[12]</sup>、战国中期的章丘女郎山 M1:76<sup>[13]</sup>、战国时期的章丘王推官庄 M114:1<sup>[14]</sup>。标本烟台金沟寨 M12:1,矛身三棱形,圆釜,通长 11.2 厘米(图一,5)。

蓬莱村里集 M6 矛<sup>[15]</sup>虽没有发表器物图,从发掘报告描述可知,该矛为春秋中期,柳叶形,细长圆锥状脊直至锋端,后部与骹连为一体,骹末两侧有环形纽耳,推测为 AI 型。根据文字描述,春秋早期的长清仙人台 M6:N3<sup>[16]</sup>为叶形矛,推测为 AI 或 BI 式矛。

C 型:圭首形矛。锋端扁平,刃缘平直,叶身中下部宽度基本一致,窄刃。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。

I 式:双刃。矛身较宽。包括春秋晚期的栖霞杏家庄 I 式矛<sup>[17]</sup>、战国晚期的昌乐岳家河 M150:25、26<sup>[18]</sup>。标本昌乐岳家河 M150:26,矛身截面呈扁圆形,骹口两侧分别下凹成弧形,通长 11.2 厘米(图一,6)。

II 式:三刃。矛身三棱形,三刃前聚成锋,矛身截面多为三角形,形体较长。包括战国早期的昌乐岳家河 M135:15<sup>[19]</sup>、临淄相家庄墓 LXM6G:11-1<sup>[20]</sup>、战国中期的长岛王沟 M10 矛<sup>[21]</sup>、威海 M3:14、15<sup>[22]</sup>、章丘女郎山 M1“II 式矛”<sup>[23]</sup>。标本威海 M3:14,圆筒状长骹,上有钉孔,长 17.5 厘米(图一,7)。长岛王沟



图一 山东地区出土东周青铜矛型式图

1. AI式 薛国故城 M1 :35 2. AI式 莱芜戴鱼池墓矛 3. AII式 济南左家洼 M1 :18 4. BI式 临淄淄河店 M2:G15 5. BII式 烟台金沟寨 M12 :1 6. CI式 昌乐岳家河 M150 :26 7. CII式 威海 M3:14 8. D型 泰安黄花岭墓矛 9. E型 海阳盘石嘴子前 M1 :74 10. F型 临沂凤凰岭墓坑 :57 11. F型 莒县大沈刘庄墓 93M1:9 12. GI式 蓬莱柳格庄 M9:12 13. GII式 阳谷县景阳岗墓矛

M10 出土的三刃矛,虽刃缘中部略内凹,但整体矛叶窄长,因此可看作该式。

D型:内凹叶底舌状矛。侧刃狭窄,略外弧,叶截面为扁菱形,中脊隆起延伸至矛尖,脊两侧有血槽。包括春秋战国之交的泰安黄花岭墓矛<sup>[24]</sup>、战国初期的“阳翟”矛<sup>[25]</sup>、战国时期的沂水金花峪村 M2 :2<sup>[26]</sup>。标本泰安黄花岭墓矛,前锋锐厚,骹略呈圆锥形,通长 19.2 厘米(图一 8)。

E型:翼状镂空叶形。双刃较平直,叶与骹相连处镂空,叶末有缺口,柱状脊。包括春秋晚期的栖霞杏家庄 M2“II式矛”<sup>[27]</sup>和海阳盘石嘴子前 M1 :74<sup>[28]</sup>。标本海阳嘴子前 M1 :74,锋端圆钝,两叶与骹部分体,通过 4 条薄条相连,末端两侧设对称半环钮,通长 27.3 厘米(图一 9)。

F型:束腰尖叶形。叶中腰两侧缘内弧,呈弯曲

状,脊凸出成棱。包括春秋中期的临沂凤凰岭墓坑:(编号)56、57<sup>[29]</sup>和春秋晚期的莒县大沈刘庄墓 93M1:9<sup>[30]</sup>。

临沂凤凰岭墓坑(编号)57,骹中空直透前端,骹口略成椭圆形,尾部有半圆形双尾叉,骹上有一对圆形钉孔,素面,通长 30.7 厘米(图一,10)。56号矛与之形制相同,通体压印菱形暗纹。莒县大沈刘庄墓 93M1:9,矛身装饰几何形暗纹,銜略残,椭圆形,残长 26.1 厘米(图一,11)。

G型:三角形矛。矛身成三角形,叶底部最宽,骹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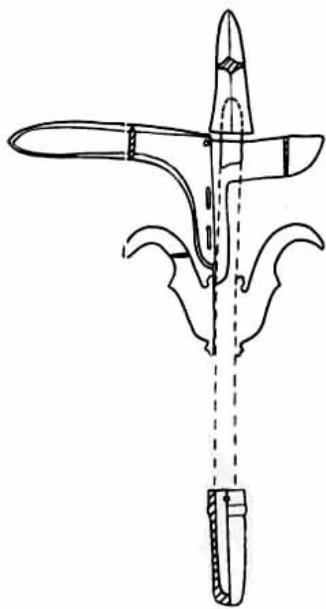
I式:双刃。仅 2 件,包括春秋中期的蓬莱柳格庄 M9:12<sup>[31]</sup>、战国晚期的栖霞大丁村墓 M4 :7<sup>[32]</sup>。标本柳格庄 M9:12,圆柱状长骹,通长 6.8 厘米(图一,12)。

II式三刃。包括春秋晚期的阳谷县景阳岗墓矛<sup>[33]</sup>、战国早期的青州赵铺 M14 20<sup>[34]</sup>、战国晚期的昌乐岳家河 M150 27<sup>[35]</sup>。标本阳谷县景阳岗墓矛 报告误定为“镞”，实心脊，圆柱状骹上有一钉孔，通长10.2厘米(图一,13)。

在发掘报告中，还可见到一种“矛”，叶与骹界限不很明显，甚至连为一体，形制较小，常见于战国时期。实际上此类矛头应为戟刺，章丘女郎山 M1 和梁山平湖战国墓<sup>[36]</sup>都曾出土(图二)。以此为参照，以往报告误认为矛的还有潍坊昌邑山埠子顶埠(编号)7<sup>[37]</sup>、沂水袁家庄乡埠子村 M4:21、22<sup>[38]</sup>。沂水高桥镇马家方庄村 M7 3、4<sup>[39]</sup>，形制较小，矛身瘦长，可能为戟刺。

矛也可以直接与戈、钺组合成戟使用<sup>[40]</sup>。观察墓葬遗迹图中器物的出土位置，薛国故城矛 M1 35 号矛与 34 号戈、临淄淄河店 M2G: 32 矛与 2 件钺原应连缀在一起，配套作为戟使用。但是这类戟刺又与纯粹的矛头形制无异，可视为一器二用，并不影响上文的型式划分结果。辨别这类矛，需要在发掘过程中注意矛与戈、钺之间的位置关系。

对比上述 7 种类型青铜矛的形制特点可以发现，D-G 型矛出土数量较少，形制存在一定的差异；A、B、C 型矛形制比较接近，具有一定的演变关系。AI 和 BI 式矛出现在春秋早中期，战国时期已经减少，晚期被 CI 型圭首形矛取代。AI、BI 式矛的缺点都比较明显。AI 式矛叶较宽，穿透力较弱。BI 式矛



图二 章丘女郎山 M1 出土戟 M1 51

通过收窄矛叶、侧刃直接前聚成锋，提高了穿透性，但由于青铜韧度较差，前锋越尖利，强度反而越低，容易发生弯曲或者断裂，损坏率较高。相比于春秋时期的 BI 式矛，战国早期 BI 式矛叶已经开始变宽，血槽明显变宽阔，刃部更狭窄锋利，但整体形态仍较长。在 AI、BI 式矛的基础上，CI 式矛取长补短，通过窄刃收锋将形体变宽短，使前锋具有良好的耐用性的同时又保证了穿透力，实现了低损耗和高杀伤力的有效统一。AII、BII 和 CII 式三刃矛，则是由相对应的双叶矛演化而来。相比于双叶矛，三刃矛一般形体较细长，在刺杀敌人时可以增加创伤面和血流量，穿刺力和杀伤力明显增强，因此战国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，流传的时间也比双叶矛长久些。

## 二

东周时期，周室式微，诸侯林立。这一时期，山东地区分布着齐、鲁、滕、莱等诸多国家，对内大国对小国的不断兼并，对外又有境外诸侯国的攻伐。作为战争的物质载体，一方面，山东各国都很重视兵器的改良，以求提高战斗力，另一方面，他国兵器通过战争形式也进入山东地区。山东地区分布的东周青铜矛形制复杂多样，结合时空布局，对比同时期东周列国青铜矛形制，下文拟各型矛的文化属性和社会背景进行讨论。

由于山东地区尚未发现西周青铜矛，暂且无法弄清西周至东周之间的具体演化环节。从其他地区来看，西周晚期的柳叶形和阔叶形矛延续到东周时期<sup>[41]</sup>。大约在春秋早中期，AI 和 BI 式矛已经在山东出现。对比形制，临沂凤凰岭墓出土的 AI 式矛与三门峡虢国墓西周晚期矛 IISC :11、12<sup>[42]</sup>很相似，皆为圆阔叶、柱状长骹。莒南大店 M1 矛与上岭村虢国墓西周矛 M1810:14<sup>[43]</sup>也很接近，都是长窄叶、长骹。由此说明，山东地区出土的 AI、BI 式矛同样是对西周叶形矛的继承和发展。

C 型圭首窄刃矛在山东以外的其他地区并无发现，应是山东地区的独有式样。C 型矛最早见于春秋晚期的栖霞杏家庄 M2。栖霞位于胶东地区，春秋中晚期之交，此地的莱国被齐国攻灭，直至秦灭齐。从文化面貌上看，此墓保持了莱文化的腰坑殉狗葬俗，出现了齐文化常见的“BIV 式圆底陶盂”，文化面貌上正处于向齐文化过渡时期<sup>[44]</sup>。到战国时期，C 型矛迅速扩展，出土频率最高，数量最多，而且出土墓葬的等级较高。如长岛王沟 M10、章丘女郎山 M1、临

淄相家庄墓 LXM6 都是齐国贵族墓葬。长岛王沟 M10、章丘女郎山 M1 陪葬的 CII 式矛数量多达 7 件,长岛王沟 M10 矛出土时上面还有丝织品包裹的痕迹。昌乐岳家河 M150 中也出土了 2 件 CI 式矛。可见,C 型矛不仅是齐国青铜矛中最主要形制,也是齐国的重要兵器之一。

D 型矛仅有 3 例,但舌状矛身、叶末内凹的特征很独特。泰安黄花岭墓矛与易县燕下都出土的“郾王”矛<sup>[46]</sup>形制相似,但无铭文。2006 年临淄齐故城出土的“阳翟”矛,器身略瘦长,经孙敬明先生考证,为战国初期韩国兵器。从出土国别和地域来看,该形制矛流传较广,燕国、韩国都曾制造过。由于山东地区该矛出土数量少,暂且只能肯定 D 型矛是战国时期北方地区流行的一种器形,渊源则不明。战国初期,韩、赵、魏三家分晋后都积极谋求向外发展,齐国曾多次与三晋发生战争。《史记·韩世家》记载:“(韩文侯)七年,伐齐,至桑丘。郑反晋。九年,伐齐,至灵丘。”在齐境内发现“阳翟矛”,可能是战争中韩兵遗留物或齐兵作战的战利品。

E 型矛镂空叶、翼状叶末的造型,仅见于春秋晚期的胶东地区。根据《史记》记载和 M4 铜器铭文内容分析,海阳嘴子前墓群属于陈国田氏奔齐后所得的封邑上建立的族墓<sup>[46]</sup>。但是 M1 出土了具有莱文化因素的铜簋,与栖霞杏家庄 M2 同样莱、齐文化并存<sup>[47]</sup>。考察 M1 :74 骹末端两侧的环钮,只有蓬莱村里集 M6 矛与之相同。蓬莱村里集 M6 为春秋中期,略早于海阳嘴子前 M1,文化面貌上属于典型的莱文化。海阳嘴子前 M1 :74 的环钮应是沿袭这一文化因素。栖霞杏家庄 M2 规模较大,除陶器外,还随葬漆器、兵器和车马器。发掘者认为墓主是一位武官,属于士大夫阶层。杏家庄 M2 与海阳嘴子前墓地缘很近,年代一致,结合当时历史背景分析,杏家庄 M2 墓主应是在齐占领莱国初期田氏势力辖区内的贵族。观察矛身轮廓,杏家庄 M2 中的“II 式矛”与“I 式矛”同为尖锋直刃,具有 C 型矛的因素。翼状叶末的造型与翼状青铜镞相似,可能受其影响。但矛叶镂空的做法,齐、莱文化中均未出现。综合来看,E 型矛的来源尚不清晰,也不排除田氏自造兵器的可能性。

F 型矛的来源最为清晰,学界已经明确指出该型属于典型越兵,矛身上的菱形暗纹装饰也是其独特的制造工艺<sup>[48]</sup>。临沂凤凰岭墓坑 56 与江苏丹徒青龙山 M1 :44<sup>[49]</sup>形制完全一致,而且矛身上都铸有菱

形暗纹,属越式矛无疑。越式矛制作精良,传播很广,甚至秦地凤翔高庄 M1 也有发现。春秋中晚期,临沂和莒县属于莒国辖区<sup>[50]</sup>。莒国与吴越地理位置接近,在莒国发现吴越兵器,应是文化传播的产物。

GI 型矛只有 2 件,造型比较简单,器形不甚规整。虽然都出土于胶东地区,但是时间差距很大,没有明显的传承关系,推测为地方土著产物。

AII、BII、CII、GII 式窄身長叶三刃矛也是这一时期齐式矛的特色,大量流行于战国时期的齐国辖区。东周时期,齐国是一个军事大国。有学者根据史书记载统计,短短 250 多年内,齐国正式出战的战争多达 132 次<sup>[51]</sup>。为了提高军事力量、巩固政治统治,齐国必须不断地改良兵器,创造功能更领先的兵器。圭首形窄叶矛和窄身長叶三刃矛的流行便是这一需求的客观反映。

### 三

综上所述,春秋早期,山东地区的矛形制沿袭了西周叶形矛。春秋晚期,在叶形矛的基础上,齐国创造出圭首窄刃矛和窄身長叶三刃矛,并随着齐国势力的强盛和疆域的扩张,逐渐占据主流地位,带有土著文化因素的青铜矛只是昙花一现。春秋中期和晚期,越式矛曾传入莒国,但没有引发新器形的出现。战国时期七雄割据,三晋、楚、燕等国都曾攻入齐地,山东境内出土的韩国“阳翟矛”是战争的见证。

[1] [47] 王青《海岱地区周代墓葬研究》,山东大学出版社,2002 年 8 月。

[2] 山东省兖石铁路文物考古工作队《临沂凤凰岭东周墓》,齐鲁书社,1987 年。

[3] 山东济宁市文物管理局《薛国故城勘察和发掘报告》,《考古学报》1991 年第 4 期。

[4] 临朐县文物局《山东临朐县湾头河春秋墓》,《考古》1999 年第 2 期。

[5] 莱芜市图书馆、泰安市文物考古教研室《山东莱芜市戴鱼池战国墓》,《文物》1989 年第 2 期。

[6] 济南文化局、历城区文化局《山东济南左家洼出土战国青铜器》,《考古》1995 年第 3 期。

[7] 山东大学考古教研室《泗水尹家城》,文物出版社,1990 年。

[8] 山东省博物馆等《莒南大店春秋时期莒国殉人墓》,《考古学报》1978 年第 3 期。

[9]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《山东淄博市淄川区淄河

店二号战国墓》《考古》2000年第10期;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《临淄齐墓(第一集)》,文物出版社,2006年12月。

[10] 枣庄市文物管理站《枣庄市南部地区考古调查记要》《考古》1984年第4期。

[11] 烟台市博物馆《山东烟台金沟寨战国墓葬》《考古》2003年第3期。

[12] 任相宏、张光明、刘德宝主编《淄川考古》,齐鲁书社,2006年9月。

[13] 李日讯《章丘绣惠女郎山一号战国大墓发掘报告》,《济青高级公路考古发掘报告集》,齐鲁书社,1993年。

[14]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《山东章丘市王推官庄遗址发掘报告》《华夏考古》1996年第4期。

[15] 山东烟台地区文管组《蓬莱县村里集西周墓葬》,《文物资料丛刊(3)》,文物出版社,1980年5月。

[16] 山东大学考古系《山东长清县仙人台周代墓地》《考古》1998年第9期。

[17][27] 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、栖霞县文物事业管理处《山东栖霞县占疃乡杏家庄战国墓清理简报》,《考古》1992年第1期。

[18][19][35] 山东潍坊市博物馆、昌乐县博物馆《山东昌乐岳家河周墓》《考古学报》1990年第1期。

[20]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《临淄齐墓(第一集)》,文物出版社,2006年12月。

[21] 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《山东长岛王沟东周墓葬》《考古学报》1993年第1期。

[22] 郑同修等《山东威海发现周代墓葬》《考古》1995年第1期。

[23]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《济青高级公路(章丘工段)考古发掘报告集》,齐鲁书社,1993年。

[24] 泰安博物馆《山东泰安市黄花岭出土青铜器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2000年第4期。

[25] 孙敬明《治兵偶札》,《新果集——庆祝林运先生七十华诞论文集》,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,科学出版社,2009年1月。

[26][39] 山东沂水博物馆《山东沂水县近年发现的几座战国墓》《文物》2001年第10期。

[28] 海阳博物馆《山东海阳盘石嘴子前村春秋墓出土铜器》《文物》1985年第3期;烟台市博物馆、海阳市博物馆《海阳嘴子前》,齐鲁书社,2002年9月。

[29] 山东省兖石铁路文物考古工作队《临沂凤凰岭东周墓》,齐鲁书社,1987年。

[30] 莒县博物馆《山东莒县大沈刘庄春秋墓》《考古》1999年第1期。

[31] 烟台文物管理委员会《山东蓬莱县柳格庄墓群发掘简报》《考古》1990年第9期。

[32] 李元章《山东栖霞县大丁村战国墓的清理》,《考古》1995年第11期。

[33] 聊城地区博物馆《山东阳谷县景阳岗村春秋墓》《考古》1988年第1期。

[34] 青州市博物馆 夏名采《青州市青铺遗址的清理》《海岱考古(第1辑)》,山东大学出版社,1989年9月。

[36]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《山东梁山县东平湖战国墓》《考古》1999年第5期。

[37] 潍坊市博物馆《山东潍坊地区商周遗址调查》,《考古》1993年第9期。

[38] 沂水县博物馆《山东沂水县发现五座东周墓葬》《考古》1995年第4期。

[40] 沈融《东周青铜戟的一种形制及其相关问题》,《华夏考古》1998年第2期。

[41] 沈融《商与西周青铜矛研究》《考古学报》1998年第4期。

[42] 常军《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》《文物》2009年第1期。

[43]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《上岭村虢国墓地》,科学出版社,1959年。

[44] 参见王青《海岱地区周代墓葬研究》一书对胶东地区的文化面貌分析。

[45] 河北省博物馆、文物管理处编《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》,文物出版社,1980年5月。

[46] 马良民、林仙庭《海阳嘴子前春秋墓试析》,《考古》1996年第9期;林仙庭《嘴子前墓群与田氏代姜之变》,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》1998年第1期。

[48] 参见肖梦龙《试论吴越青铜兵器》《考古与文物》1996年第6期;郑小炉《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》,科学出版社,2007年12月。

[49] 丹徒考古队《丹徒青龙山春秋大墓及附葬墓发掘报告》,《东方文明之韵——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岭南美术出版社,2000年。

[50] 杨善群《莒国史诸问题探讨》,《学术月刊》2001年第4期。

[51] 徐勇《先秦时代齐国参加的主要战争述略》,《烟台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1997年第2期。

(作者系上海复旦大学

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研究生)